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评估及相关思考

韦 红

[摘 要] 社会资本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以信任、规范为特征的社会资源,它能够被拥有者利用以实现自身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断扩大,但仍有不足。为进一步扩大国际社会资本,中国应争取拥有更多的国际组织成员身份,加强与国际民间组织和大国的关系,争取创设国际机制的权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以此增加国际社会的期望和信任。

[关键词] 中国;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国际社会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9)06-0837-06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首先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分析以来,“社会资本”理论受到各方学者广泛关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法学家纷纷用之探讨各自领域的问题。尽管出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各领域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有所差异,但在一些核心内容上却是达成共识的,即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无形资源,而这种资源一旦被行动者拥有和利用,便能够创造现实价值,有助于行动者目标的实现。因此,对于行动者来说,拥有社会资本多多益善。本文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框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评估,并对中国如何扩大社会资本以实现和平发展目标提出一些思考。

一、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所谓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1](第 202 页)。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便于行动者、蕴藏于社会结构中的资源。在他看来,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将自己控制的资源与他人进行交换,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久存在的社会关系,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种个人资源,这就是社会资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信息网络、多功能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等等都是社会资本的特定形式。他进一步指出:“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2](第 354 页)美国社会学教授林南认为,“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的,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3](第 28 页)林南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类似于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分层中,社会地位越高,发展社会关系就越容易,摄取各种稀缺资源的能力就越强,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由以上定义看出,社会资本是一种来自于社会关系网络并能给拥有者带来某种回报的资源。

另有一些学者则将规范、信任、合作等内容视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美国社会学教授帕特南认

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4](第 195 页)“社会资本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解决集体行动的难题。由于社会信任与网络关系,可以提供一种机制,促使集体需要的行动的产生。”^[5](第 288 页)日裔美籍学者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相互合作、或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这种规范从两个朋友的互惠性规范一直延伸到那些像基督教或儒教之类的复杂精巧的教条,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6](第 72 页),“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那个社团的角色。这里所指的规范可能是深层的价值观,也可能包括世俗的规范。”^[7](第 30 页)

从以上种种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論描述中可以概括出以下一些命题:第一,从社会资本的来源上看,社会资本根植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任何行动者只能通过关系网络才能拥有、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而且,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越丰富。第二,从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看,当社会网络关系被加以工具性的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本身就成为社会资本。而成为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又是以共享规范、信任、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网络、规范、信任等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第三,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看,社会资本一旦被行动者利用和投资,如同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便能创造现实价值,即不仅为个体行动者在社会结构内部的行动提供便利,增强其实现目标的能力,而且还有助于团体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合作。因此,投资社会资本是可以获得回报的。

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资本评估

由于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获取回报的社会资源,因此谁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谁就有较多的优势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国际社会同样如此。一国外交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不仅取决于物质实力的强弱,同时还受到在国际社会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大小的影响。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评估。

根据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命题,本文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质量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作为评估中国国际社会资本的指标体系。

(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既是社会资本的来源,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本身。行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与他人联系越密切越频繁,意味着其社会资本越丰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改变过去孤立于国际社会的状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与国际社会形成了从双边到多边、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关系网络。具体表现为:(1)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双边关系。目前中国与世界上 160 多个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并与不同的国家发展不同类型的友好合作关系,如: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法国、意大利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英国、德国、加拿大、巴西、印尼、阿根廷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越南、蒙古、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建立友好合作关系。(2)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入各种国际机制,主动嵌身于国际社会网络之中。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的多边条约只有 38 个,而在 1978 年至 2004 年间,中国参与的多边条约达 215 个,内容涉及到国际法、裁军、外空、极地、海洋、交通、邮政、电讯、环境、国际贸易、投资、金融、海关、反恐等各个领域^①。加入国际组织方面,“目前我国参加的政府间组织的数量是 1977 年的 12 倍,加入的非政府组织是 1977 年的 44 倍。”^[8](第 10 页)(3)针对具体问题领域,与一些重要国家建立起双边或多边对话合作机制。如与美国的经济、军事交流对话机制,针对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与东亚国家的“10+1”、“10+3”合作机制,与中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等。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网络急剧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社会资本增大,不过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与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国际组织参与率仍相对落后。截至 2003 年,中国的各类政府间国际组织参

与率只有3.98%,世界排名36位。与美国相比,差距甚大。在各类政府间组织中,中国的参与率只有美国的69.23%。在各类非政府组织中,中国的参与率只有美国的44.21%^[9](第301,298页)。二是中国还不善于从非政府层面上来扩展与国际社会成员的良性互动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致力于与各国政府建立起友好合作关系,但由于对各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缺乏敏感性,同时又对其抱有一定的戒心,因而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着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它们与中国日益扩大的距离消除了它们有兴趣更加明辨是非地、客观地看待中国面对的问题所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10](第34页)另外,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非政府的个人层面上的交往也较为缺乏,许多外国官员、知识精英、商界领袖没有中国朋友,这也影响到中国国际社会资本的积累,因为“副部级以上的朋友间的一个电话往往比一个千人左右的团体更有影响力”^[10](第46页)。

(二)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质量

社会资本的多寡不仅仅取决于与他人联系的数量与规模,还取决于与他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质量。如前文所述,共享规范、信任等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只有共享规范、互信的社会关系网络才能为其成员行动提供便利,增强行动者实现目标的能力。因此,共享规范、信任等也是考察行为者社会资本存量的重要指标。

1. 共享规范。所谓规范,是指人们行为的标准和程序。规范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技术性规范,指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标准和程序。二是社会规范,是人们进行各种交往活动需要遵守的规范。它是人们为了解决交往中存在的问题、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确立的行为规矩,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三是理想化的“模范”,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某种总体精神或基本理念。与社会规范所做出的较具体、明确的规矩不同,“模范”是一些比较形而上的理论化观念性的东西,如自由、民主、正义等价值理念^[11](第16页)。社会资本理论中的规范概念,主要是指第二、三两类规范,如福山的社会资本定义中所谓的“世俗的规范”就相当于“社会规范”,而“深层的价值观”则相当于理想化的“模范”。考察中国与国际社会共享规范状况,也需从工具性的“社会规范”和理想化的“模范”两个层面来进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体系,自觉遵守和接受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在一些工具性的社会规范上已与国际社会达成广泛的共识。与国际社会共享社会规范不仅使中国获取了物质利益,如资金、信息、机会等,而且还收获了如声望、信任等社会资本。如中国接受苛刻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国还签署了《生化武器公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等,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2002年9月3日,并非《京都议定书》签字国、没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和义务的中国宣布批准该条约,这一切都使中国获得巨大的政治声望。因此,从工具性社会规范层次来看,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使得中国的国际社会资本获得显著扩大。

在理想化的“模范”即“深层次价值观”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根深蒂固的偏见,使得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只有单纯的经济、安全利益的考虑,缺乏一种价值基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使得中国的国际社会资本受到一定的制约。

2. 信任。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主动接受国际规则规范以及与各国务实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关系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信任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如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由于历史上朝贡体系的阴影,很长时间内“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大有市场,而近十几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各种合作关系的建立,使得双方互信得到大大增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明确表示:“中国已经强烈地证实了其和平崛起以及同其他国家在双赢基础上合作的意图……这将培养起中国与东盟更紧密的关系。”^②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也表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以信任、互利、理解为基础的,是建立在‘繁荣你的邻居’这一信念之上的”^③。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信用。国际民意调查显示,总体上对中国持赞同态度的国家要大于持否定态度的国家,26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持积极的看法,有9个国家对中国主要持负面的看法,1个国家则意见中立^[12](第35页)。

尽管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信任不断增加,但这种信任是不平衡的。首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中国的信任程度是不同的。如在非洲和一些中东国家,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比例较高。但在欧洲、土耳其和美国,则是否定看法占主导地位。在 9 个欧洲国家民调中,有 6 个国家负面看待中国^[12](第 35 页)。其次,在不同的领域,对中国的信任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世界上的公众有着更加一致的看法,期待中国在经济上赶上美国,并不必然将其看作是负面的。但在政治领域,大多数公众并不信任中国在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④。在军事领域,对中国的不信任程度更高。一位外国学者写道:“在一个军费预算迅速增长的时代里,坚持‘中国不是威胁’只能损害中国的可信程度。”“今天中国所拥的信任和理解两项资产比其应该拥有的更少。”^[10](第 42, 47 页)

(三) 中国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行为者在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地位越高,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大。在一个资源竞争的条件下,网络中的位置比关系的强弱亲疏更加重要。因此,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也是评估中国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

从全球层次来看,中国近 30 年来主要是以融入国际社会为主,而非主导国际社会,这就决定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不占优势。“中国在已参加的国际组织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影响不强。尽管中国在安理会中有一定的地位,但整体看来,中国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很难说进入决策层主流,发挥核心作用。”^[9](第 299 页)。由于在国际社会关系网络中不占优势地位,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大受限制,与西方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以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中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为例,“2007 年,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势均力敌,美、英、法三国是盟友水平,中、俄是盟友水平。这意味中国的国际政治规则制定权相当于美国的 2/3,约为 66.7%。同年,中美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分别为 2.81% 和 16.41%,中国的投票权相当于美国的 17.1%;中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分别为 3.66% 和 16.79%,中国的投票权相当于美国的 21.8%,两者的平均值为 19.5%。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 1/5。将中美政治规则制定权的比例(66.7%)和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比例(19.5%)求平均值,则得到中国的总体国际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 43.1%。”^[13](第 28 页)因此,尽管中国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参与了大量的国际组织,但国际社会资本的扩大仍受到一定的制约。

从地区层次上看,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议程创设能力相对于全球层次要强。中国积极参与“10+3”、“10+1”等合作机制,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主动探索国家间关系新准则,在促成地区共享规范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2003 年,中国首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此带动了周边众多国家如日本、印度、韩国、巴基斯坦、俄罗斯、新西兰、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国纷纷加入,这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各项原则和行为规范成为周边各国所接受的共同价值规范,该条约“现在正成为东亚和平、睦邻宪章”^⑤。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所倡导的“上海精神”也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上海精神”没有停留在纸面上,而是成为各国发展互信、平等、相互尊重和睦邻友好关系的有效准则^⑥。这显然是中国在多边主义框架下与周边国家互动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社会资本增长的重要表现。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国际社会资本的评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从社会资本的载体——关系网络来看,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各种联系日益广泛,来源于此的中国国际社会资本也不断扩大。不过,与其他大国相比,仍有差距。第二,从构成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看,总体上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共享规范、建立信任关系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见,使得中国的国际社会资本受到一定的制约。第三,从在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来看,中国在地区层次的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和地位要高于全球层次,因此中国在地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要高于在全球拥有的社会资本。

三、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资本的相关思考

拥有社会资本的实质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共享规范和信任关系,以较小的成本获取较多的资

源,它是拥有者超越“强权”和“市场”来实现自身目标的第三道路。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除了不断加强物质实力外,扩大国际社会资本也是路径之一。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来实现外交目标可以避免单凭实力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中国威胁论”。笔者认为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致力于中国国际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扩大:

1. 争取拥有更多的组织成员身份,特别要加强与国际民间组织和一些大国的关系。中国要不断扩大国际社会资本,应加强三个方面的外交:一是要拓展与国际社会网络关系规模。加入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官方的或民间的国际机制,使自己拥有更多的组织成员资格和身份,这是扩大社会资本的必经之路。二是要加强与外国非政府层面上的关系。由于冷战后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开始介入到过去被政府高层垄断的国际事务中来,它们对国家外交决策构成强大压力,因此中国要扩大国际社会资本,不仅要加强与外国政府间的关系,更要加强与外国民间组织的关系,争取他国民间力量的认同和信任至关重要。另外,通过私人交流,建立起与外国精英的朋友关系也是扩大社会资本的一条路径。“对于中国和外国人来说,这种方式有助于解决‘我们——他们’、‘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类导致交往困难的问题。”^[10](第47页)三是加强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与行为者有联系的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大小也是影响行为者社会资本数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小国相比,大国在各种组织网络中所拥有的各种资本要大得多,因此一个有效的扩大国际社会资本的策略就是建立起与大国稳固、良好的关系,避免与其直接对抗,使其成为可靠的资源。因此,中国必须把握好与大国的关系。

2. 占据国际组织网络中的优势地位,争取创设国际机制的权力,推动国际社会在价值规范上达成广泛的共识。由于社会资本的大小与个体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因此,个体成员要扩大社会资本,在合理利用“现有位置”外,还需努力获得较为理想的“自致位置”。中国要想获得较为理想的“自致位置”,不应只是被动地参与现存的国际机制,还应想方设法争取创设国际机制的权力,占据国际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推动国际社会在工具性的“社会规范”和理想化的“价值规范”上达成广泛的共识。中国不仅要在国际社会继续倡导“和谐世界”观,而且还应推动和创设各种国际机制实践之,使之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要做到这一点,虽任重道远,但并非空想,因为“和谐世界”观不仅是中华“和合”文化的体现,更与各大文明中“和平”要素相通,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公正、繁荣等价值相吻合,所以在国际社会推动“和谐世界”的价值共识是可行的。目前的关键是中国当在国际社会中争取理想的“自致位置”推动之。

3. 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此增加国际社会的期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促使信任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成员间物质利益的等价交换,而在于其他,即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共享规范价值”外,还在于通常存在的“义务与期望”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暗指一种即期的、正式的法律或商业契约的经济交换,而是短期利他与长期自利相结合的一种产物。行动者为他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利益,但一般来说,行动者期望这种牺牲能够在将来的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就能得回报”^[14](第62页)。也就是说,付出往往能够换来别人的信任、期待以及回报。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承担的义务越多,无论这些义务涉及的资源是什么,他所拥有的、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富。因此,要想获取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和平发展的回报,中国在物质实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应当尽其所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预先进行中国信用投资。

注 释:

①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zjg/tyfls/tfscckzlk/zgcjddbty/t70814.htm>)《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一览表》(截至2004年12月)统计得出。

② 参见 Lee Hsien Loong, “The Future of East Asian Cooperation”, 载 <http://www.aseansec.org/17474.htm>, 2005-05-25。

③ 参见 H. E. Ong Keng Yong, “Securing a Win-Win Partnership for ASEAN and China”, 载 <http://www.aseansec.org>。

org/16255.htm, 2004-06-23。

- ④ 参见“World Publics Think China Will Catch Up with the US-and That's Okay”, 载 http://www.worldpublidopinion.org/pipa/pdf/nay07/CCGA+-RiseChina_article.pdf, 2007-05-25。
- ⑤ 参见 YAB Dato' Seri Abdullah HJ Ahmad Badawi, “Towards an Integrated East Asia Community”, 载 <http://www.aseansec.org/16962.htm>, 2004-12-06。
- ⑥ 参见《国际社会关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载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4478567.html>, 2006-06-16。

[参 考 文 献]

- [1] 包亚明:《布尔迪厄言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2] [美]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邓方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 [3] [美]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 张磊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5 年版。
- [4] [美] 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 王列等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 [5]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 [6] [美] 弗兰西斯·福山:《公民社会与发展》, 载曹荣湘:《走出囚徒困境: 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 [7] [美] 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的繁荣》, 彭志华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1 年版。
- [8] 俞新天:《2007: 软实力建设的标志年》, 载《外交评论》2007 年第 6 期。
- [9] 王 玲:《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比较研究》, 载李慎明、王逸舟:《2007 年: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 [10] Ramo, Joshua Cooper. 2007. *Brand China*.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
- [11] 马俊峰:《重视规范价值的研究》, 载《哲学动态》2007 年第 1 期。
- [12] d'Hooghe, Ingrid. 2007. *The Rise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The Hague: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 [13] 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 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1 期。
- [14] 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责任编辑 叶娟丽)

Assessment and Thoughts on Chinese Social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Wei Ho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Stud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is a kind of social resource in social relation networks, its features are trust and norm, and the owners can use it to realize their own objectives. The Chinese social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greatly increased since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but is still not enough. To further expand the social capital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 should accede mo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 with the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 great powers, strive for the right of found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houlder mor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n order to win more expectations and trus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Key words: China; social capital; social relation networks; international society